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名家治学

如何把“死”知识变“活”

编者按：现代社会，信息爆炸，知识浩如烟海。我们在泛舟书海学海之时，千万不可迷失，不能做满腹诗书的“睁眼瞎”。学习知识、研究学问，价值在于活学活用。怎样将“死”知识变“活”，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呢？国学大师朱光潜给出了答案。

□ 朱光潜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加以有机化，这就是说，要使它像一朵花、一只鸟或是一个人，成为一种活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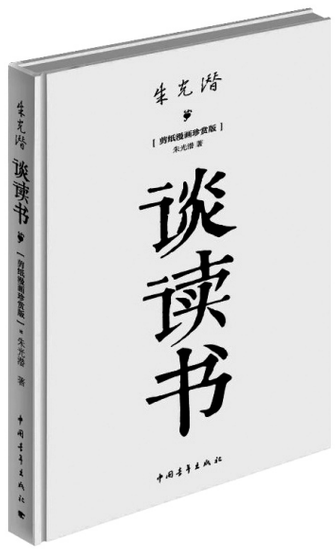
一种活的小东西就是一种有机体，有机体有三个大特征：第一，有机体的全体和部分融会贯通，有共同生命流注其中，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第二，有机体的生长是化学的化合而非物理学的混合，是由于吸收融化而非由于堆砌。第三，每个有机体都有它所特有的个性，两个有生命的东西不能完全是一样的。

有机体的这三大特征也就是学问的特征。第一，学问不是学问，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的生命，用普通话来说，如果它没有“组织”，不成“系统”。第二，学问不是学问，如果它的生长不借消化而借堆砌，不能把异体变为己体，这就是说，不能把从外面吸收来的知识纳进原有的系统里去，新来的与原有的结成一个有生命的整体。第三，学问不是学问，如果它在你心里完全和在我心里一样，没有个性。没有个性也没有生命，原因在没有经过自己的组织和创造。

一切学问的对象都不外是事物的关系条理。关系条理本来存在于事物中间，因为繁复所以显得错乱，表面所呈现的常不是实际所含蕴的。我们的蒙昧就起于置身繁复的事物中，迷于表面的错乱而不能见出底蕴，眼花手乱，不知所措。学问——无论是科学、哲学或是文艺——就在探求事物的内在的关系条理。这探求的企图不外是要回答“何”（what）“如何”（how）“为何”（why）三大类问题。回答“何”的问题要搜集事实和认清事实，回答“如何”的问题要由认清事实而形容事实，回答“为何”的问题要解释事实。这三种问题都解决了，事物就现出关系条理，在我们的心中就成立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做学问第一件要事是把知识系统化、有机化、个性化。这种工作的程序大要有两种。姑拿绘画来打比。治一种学问就比画一幅画。画一幅画，我们可以先粗枝大叶地画一个轮廓，然后把口鼻眉目等节目一件一件地画起，画完了，轮廓自然现出。比如学历史，我们先学通史，把历史大势作一鸟瞰，然后再学断代史、政治史、经济史等专史。这是由轮廓而节目。反之，我们也可以先学断代史、政治史、经济史等，等到这些专史都明白了，我们对于历史全体也自然可以得到一个更精确的印象。这是由节目而轮廓。一般人都以为由通而专是正当的程序，其实不能通未必能专，固是事实；不能专要想真能通，也是梦想。许多历史学者专从政治变迁着眼，对于文学哲学宗教艺术种种文化要素都很茫然，他们对于历史所得的轮廓决不能完密正确。

就事实说，在我们的学习中，这两种貌似相反的程序——由轮廓而节目，由节目而轮廓——常轮流并用。先画了轮廓，节目就不致泛滥无归宿，轮廓是纲，纲可以领目，犹如架屋竖柱，才可以上梁盖瓦。但是无节目的轮廓都不免粗疏空洞，填节目时往往会发现某一点不平衡，某一点不正确，须把它变动才能稳妥。节目填成的轮廓才是具体的明晰而正确的轮廓。做学问有如做文章，动笔时不能没有纲要，但是思想随机触动，新意思常涌现，原定的意思或露破绽，先后轻重的次第或须重新调整，到文章写成时全文所显出的纲要和原来拟定的往往有出入。文章不是机械而是自由生发的，学问也是如此。节目常在变迁，轮廓也就随之变迁，这并行的变迁就是学问的生长。到了最后，“表里精粗无不到，然后一旦豁然贯通”，学问才达到了成熟的境界。



书名：《朱光潜谈读书》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4月

用典释义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摘自习近平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作报告时的插话

■ 解读

清，指的是清廉，公正廉洁，两袖清风；慎，指的是慎重，周密考虑，谨言慎行；勤，指的是勤勉，勤奋好学，刻苦上进。习近平同志强调领导干部要正确使用手中权力，必须能够做到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严守党纪国法；自觉做到秉公用权、不以权谋私，依法用权、不假公济私，廉洁用权、不贪污腐败；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想干事、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对工作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忘我奉献，真正做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能否干干净净干事，是每一位领导干部经常面临的重大考验”，这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领导干部做到这三个字，根本上说还是要加强修养、提升境界，培养和树立六种意识：信仰意识、公仆意识、自省意识、敬畏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

（节选自《习近平用典》，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

黄侃的精读

□ 毛本栋

黄侃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字季刚，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生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与其师章太炎并称为“章黄学派”，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巨大且深远的影响。黄侃一生治学严谨，读书极多而精细，很有心得，总结他的读书之道，可用“批注圈点精读书”来概括。

黄侃读书非常认真，喜欢随手圈点，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一遍。他曾圈点《文选》数十遍，圈点《汉书》《新唐书》三遍。读《清史稿》时，全书共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批注圈点，绝不跳过。他曾说：“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须有相当成就；否则，性懦者流为颓废，强梁者化为妄诞。用功之法，每人至少应该圈点书籍五部。”他如是说亦如是做。他每读一书，一定从头至尾，而且要标点并加批注。读书时，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时就寝。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黄侃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完才就寝。黄侃读过一部吴承仕的《经籍旧音辨证》，上面和作者商榷的批语就达400多条。他的再传弟子、古代文史学家程千帆曾赞叹，经黄侃所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等书，精义纷呈。

当代学者陆昕曾在《听祖父讲名士黄侃趣事》一文中，详细记录了祖父陆宗达（黄侃的学生，著名语言学家、训诂学家）回忆黄侃读书的故事：“季刚先生爱游玩，有时白天我陪他逛名胜，作诗填词，晚间一顿饭直吃到半夜十一二点，我回家时已是满地月光寂无人声。我就想，季刚先生恐怕也累得够呛，现在是倒头便睡了吧？结果第二天一早八点时我到他家去上课，他桌上已经有好几卷书全部用墨笔细细地批点圈阅过了，所以我总疑惑他不睡觉。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他常常从夜半十二点开始读书批点，直到四五点钟才躺下，睡三四小时即起身。”祖父还对陆昕说：“季刚先生有一次闲聊时问我，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我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季刚先生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什么是呢？季刚先生一笑，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可见批注圈点式读书是黄侃的一大人生乐事。

黄侃喜欢夜读，常坐在灯下读书，把眼镜移到眉毛上面，很是投入。他高度近视，但能写蝇头小字，不论是行书正楷，行格整齐，大小均匀，甚至天地头写满了，连每行夹缝里，也批些小字。对于重要的书籍，黄侃总是正襟危坐地点读。每次读书之前，记下启卷时日，读完，再记下时日。他读书从不只是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他读清代著名经学家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每篇几乎都写得满满的，认为郝氏不对的地方，他就写一条“红勒帛”贴在旁边。陆昕自己也回忆说：“我家藏有一部商务铅印《资治通鉴》，上有黄侃圈点，每卷后皆记读书时日，所圈点多有创见，发前人所未发。”黄侃读书之精细，于此可见一斑。

黄侃这种批注圈点的读书习惯，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苦而改变。1913年，黄侃旅居上海，除夕之夜街上爆竹之声通宵达旦，而他却独坐室内，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甚至临终前，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毕。

读书方法

孟子的“不动心”



□ 沈小勇

作为四书之一，《孟子》在儒家经典中自有其尊崇的地位。其中的“不动心”思想影响深远，值得我们仔细品读。

孟子说：“我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这里的“不动心”是什么涵义呢？清代哲学家焦循是这样注解的，不动心就是“志气已定，不妄动心”。又说：“志，心所念虑也；气，所以充满形体为喜怒也。”（《孟子正义》）从这个注释可以看出，“不动心”的根源主要在于有心有气、心气一体，人的志气之定乃是内外的和谐，心能在与气的和谐互动中持守自身而真正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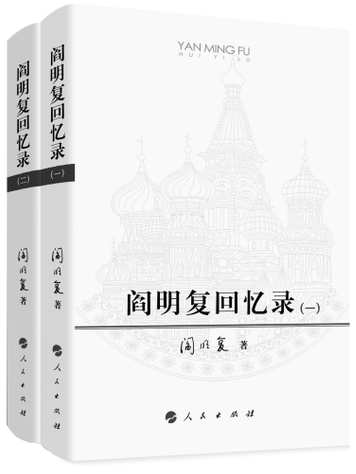
孟子的“不动心”得之于孔子的“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在不惑之年，孔子也达到了不动心，所谓“不惑”，就是不为诱惑所动，志气已定。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儒家的修养哲学都将“不动心”视为一种现实的君子人格素养，君子应当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己的理想，保持自己的操守，修炼自己的心志，从而成为真正的儒者。

孟子的“不动心”功夫是不假外求、完全求之于内的，这样心才能役物，而不是役于物。孟子以为，仁义礼智根于心，我们要保持这个本心不变，必须“存其心”，但是外界的影响和诱惑太多，因而又常常会“陷溺其心”，所以要在心志上下功夫，要养心、养气。怎样才能做到不动心呢？孟子的做法是“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就是能够明辨是非。养浩然之气，就是“配义与道”，就是养存讲求道义的正气，这种浩然之气乃是一种发自内心又作用于外在客观世界的“生命之气”。

所以，孟子的“不动心”追求一种“大丈夫气概”，孟子曾把“不动心”具体化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的大丈夫气概超越了富贵、贫贱，超越了名和利，成为内心不可动摇的君子人格力量。

名篇欣赏

重点推荐



书名：《阎明复回忆录》
作者：阎明复
出版：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编者按：6月25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阎明复回忆录》一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本书作者阎明复系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之子、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他从“哈外专”毕业后，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领导人做了17年俄文翻译。本书分（一）（二）两卷，共95万字，讲述了作者少年时代、大学岁月、翻译生涯、“文革”遭遇以及恢复工作后的许多往事。全书跨越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从九一八事变到改革开放，涉及众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其中许多有关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史料尚属首次公开。以下为章百家、李静杰、陶斯亮三人在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摘录。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这是一部具有长远历史价值的回忆录。至少在外交史领域，这是近年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回忆录。这部回忆录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反映和见证了一个大时代的变迁。现在恐怕只有阎老这个年纪的人，经过抗战和革命的年代，又经新中国开创建设，最后又经历改革开放。经历这种大时代变迁的回忆者和当事人会越来越少。阎老的回忆录首先反映的是时代变迁，其次反映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有阎老青少年时代见证他父亲阎宝航参加抗日战争、做党的地下工作的一些事情，也有后来他自己在中办翻译组时中苏关系变迁等许多重大事件，还有“文革”期间经历的一些事情，虽主要是个人与家庭的，但也不失典型意义，是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提醒人们要认真反思。

除了记述时代和重大事件，这部回忆录还有一个特点是写了很多重要的人，大量记录了阎老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以及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的接触。中苏双方都有不少当事人回忆过这段历史，但像阎老这样全面完整的回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此外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记述者的记述非常平实，所记述的基本都是作为当事人、见证人所亲见的事情，在叙述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多的个人倾向。这是一种忠实于历史的态度。

李静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阎明复同志从1952年陪同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见到斯大林，到1989年陪同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参与和见证了发生在中苏两国最高层的中苏关系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据我所知，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没有类似这样的著作，当然今后也不可能有，从这个意义上说，《阎明复回忆录》在国内外是独一无二的。

《阎明复回忆录》首次比较科学和全面地反映了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探讨中苏关系破裂原因是个世纪性课题。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下决心改善中苏关系。他委托原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组织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特别是研究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以便为苏共中央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阿尔希波夫不负重托，组织众多苏联学者和当事人进行讨论和研究，最后形成一个《总结》报告。1995年夏天明复访俄时，阿尔希波夫出于对中俄关系未来发展的期待以及对明复的友情，把《总结》报告的内容告诉了他。《总结》报告的基本观点是：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责任在苏联，是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对中国施加压力造成的。江泽民同志在得知《总结》报告的内容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要求大家研究：“中苏分裂，中国方面有什么责任？”为了回答江泽民同志的问题，在明复的领导下，1997年12月和1998年4月，围绕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和中苏大论战，在京郊分别举行两次大型研讨会。研讨会最后形成两个《纪要》，题目分别是《对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再认识》《如何认识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总的结论是：在国家关系方面，苏联的责任更大；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责任更大。仅从中苏各自参加讨论的人员构成来看，苏联的《总结》报告和中国的两个《纪要》无疑是相当权威的，结论也是比较客观和科学的。《阎明复回忆录》把中苏两个方面的总结都收了进来，让过去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的材料公之于众，从而引发更多的人思考这些重大问题，这是《阎明复回忆录》的一大新颖之处和贡献。

陶斯亮（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

我看了阎部长的书是很惊讶的，史料意义就不说了，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谈对他这个书的看法。我觉得他是用一种白描的写法，行云流水一样的文字，非常自然，非常朴素，毫无雕琢，确是真情流露，写得非常生动，有很多的人物、很多的细节，也有很多的情节，让人能够一口气地往下看，非常引人入胜。比如我看了以后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就是虽然着墨不多，但通过记述他母亲后来那种凄惨的遭遇以及最后母亲说的那些话，把一个无比坚强的女性、一个非常具有大爱精神的女性写得活生生的。没有什么添加剂，确实是原生态的一个写实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很让人信服的，也符合阎部长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对阎部长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也解答了我几个问题。我原来到统战部工作，在阎部长领导下工作两年，始终觉得阎部长不像高层领导干部，他身上有一些很独特的东西，就是我妈妈说的特别天真，对什么人都那么诚恳，掏心掏肺的，从来不严厉训斥什么人，不摆官架子，特别开明，真诚对待民主党派。我后来还问过他，你在中南海跟着中央领导那么长时间，就没学点什么？阎部长当时给我答复说，那几年我都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什么都不知道。当时真的没说服我，现在我看了他这本书以后，就找到了答案，他是继承了“阎家老店”精神的。他曾经跟我说过，当官就是服务，统战部服务的是知识分子，民政部服务的是广大弱势群体，但都是服务。他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公仆，服务老百姓的人，这是我非常佩服的。